

枢纽与创制：曾子在孔孟之道建构中的地位重估

曾维民¹ 释能诚² 释常智² 释庆缘² 释慧如²

(1. 贵州中医药大学时珍学院, 贵州贵阳, 550200; 2. 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, 江苏苏州, 215128)

版权说明：本文是根据知识共享署名—非商业性使用 4.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发布的开放获取文章。允许以任何方式分享与复制，只需要注明原作者和文章来源，并禁止将其用于商业目的。

摘要：“孔孟并称”今天已是谈论儒家思想时的惯常说法，但它并非从来如此。汉唐经学以“周孔”为宗，直到宋代，二程、朱熹才把“孔—曾—思—孟”的传道谱系确立下来。居于链条中间的曾子，因而长久被看作传递孔子思想的过渡人物，其自身的理论创造反被这种定位掩盖。本文回到《论语》《大戴礼记·曾子十篇》《大学》《孝经》等文献，参以郭店楚简，用思想脉络分析与学派路径比较的方法，重新考察曾子在孔孟之道生成过程中的位置。文章认为：曾子以“忠恕”解释孔子的一贯之道，把仁学引向内向的修持；又经由慎独诚意的工夫、三纲八目的框架与弘毅人格的范型三方面的建构，把散落的孔子教诲转成可以承传的学说体系，成为孔子仁学通向孟子心性论与仁政说的逻辑中介。重估曾子的地位，有助于补全孔孟之间的传承链条，也便于重新理解早期儒学的分化与后世道统叙事的形成。

关键词：孔孟之道；曾子；道统；思孟学派；一贯之道

DOI: <https://doi.org/10.62177/apss.v2i5.1685>

引言

“孔孟”并称，如今已是一句顺口的话。但把它放回历史里看，这一说法是慢慢形成的。汉唐之间，儒门以“周孔”为正统，孔子首先是三代礼乐的传承者；中唐韩愈作《原道》，标举“孔子传之孟轲”的谱系；此后二程、朱熹把《大学》《中庸》抬进四书，曾子、子思才被安放进传道链条，“孔——曾——思——孟”遂成为定式^[1]。程颐的话很有名：“‘参也鲁。’然颜子没后，终得圣人之道者，曾子也。”^[2]有意思的是，曾子一边被写进道统，一边又被安置在传述者的位置上：他不过是忠实地转手孔子的思想，是思孟学派的先声。他的独立见解，恰恰因为这种“过渡人物”的定位而少有人认真对待。

曾子研究的成果并不少，大致可分三路。一路做文献考据，争论《大学》《孝经》究竟谁作，《曾子十篇》成于何时，真伪问题至今没有定论^[3]。一路做思想阐释，讨论曾子的孝论、修身与人格，看他对儒家伦理的推展^[4]。还有一路借助出土简帛，清理曾子与思孟学派的授受关系^[5]。这些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，但有两处不足。一是总把曾子当作孔孟之间的传递环节，没有把他看成有独立创制的思想节点；二是谈曾子的特殊性，多半落在个人品格和具体命题上，很少上升到儒学理论形态演变的高度，去看他对孔孟之道整体格局的塑造。

本文想换一个角度：以“孔孟之道的建构”为视域，以曾子学派传世文献为基本材料，参照郭店楚简，用思想脉络分析和学派路径比较的方法，论证曾子在孔孟传承中的枢纽地位与范式意义。文章先清理曾子地位在道统叙事中的升降，说明他在孔孟思想形态转换中所处的位置；再分“承接”与“开创”两层，看他怎样内化孔子思想，又怎样在工夫、治道、人格三方面作出创制；然后贯通“孔子—曾子—子思—孟子”的线索，讨论他与孟子心性论、仁政说的关系；最后回应“曾子传道”说历来受到的质疑，并检讨早期儒学分化的多种路径。本文的着力点，是把曾子从“过渡人物”的既定形象中解放出来，从体系化创制的角度重定其思想史位置。

一、道统叙事的“隐”与“显”：孔孟谱系中的曾子定位

曾子在儒学史上的形象一直在变。先秦他是孔门的晚年弟子，汉唐他以孝行闻名，宋以后他才成为道统中的传道圣人。这种变化，反映的是不同时代儒学自身的建构需要。去掉后世叙事加上的价值滤镜可以看到：曾子最终能成为孔孟之间的关键节点，根子还在于他的思想本身，构成了孔子仁学向孟子体系化学说转换的逻辑枢纽。

（一）从孔门后进到道统中枢：一种叙事如何生成

曾参小孔子四十六岁，是孔门晚进的代表，没有进入“四科十哲”之列。《论语》中直接涉及他的章次，今人统计约有十五章，少于颜回、子贡、子路，但他独占了一章“吾道一以贯之”的授受记录，这为后世的传道者叙事留下了由头^[6]。战国时期，曾子学派已是儒家的重要分支，《孟子》屡次称引曾子言行，把他当作儒门德行的代表，曾子与孔子的传承关系由此初步建立。

汉唐之间，主流叙事是“周孔之道”，孔子被定位为述而不作的礼乐传人，曾子的位置并不显眼。他主要以孝行知名，《孝经》的流传让他成了孝道伦理的代言人，却进不了思想传承的主干谱系^[1]。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对他的记述很简略，只说他“孔子以为能通孝道，故授之业，作《孝经》”，形象依附于孔子，谈不上独立的思想地位^[7]。

转折从中唐开始，但方向与一般印象不同。韩愈《原道》标举的道统，序列是“尧——舜——禹——汤——文武周公——孔子——孟轲”，曾子并不在其中；韩愈只在与人的书序里承认“子思之学，盖出曾子”，把它当作学术渊源^[1]。把曾子正式放上传道链条，是北宋二程的事。二程推重《大学》，称其为“初学入德之门”，并明确说“孔子传之曾子，曾子传之子思，子思传之孟子”^[2]。曾子不列十哲是个现成的障碍，程颢为此辩解说：“四科，乃从夫子于陈、蔡者尔。门人之贤者，固不止此，曾子传道而不与焉，故知十哲，世俗之论也。”^[2]到朱熹手里，这套谱系才最终定型。他在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中把《大学》析为经、传两部分，断言“经一章，盖孔子之言，而曾子述之；其传十章，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”^[8]，曾子由此坐实为连接孔子与孟子的关键一环。学者对这段升格过程做过仔细梳理：宋人一面消解“参也鲁”的负面含义，把它讲成笃实有守，进而说“鲁”恰是曾子明道传道的原因；一面以“一以贯之”的提点与“忠恕”的诠释作为曾子明道的证据。随着颜、曾、思、孟于咸淳三年配享孔庙，曾子的道统地位最终制度化^[9]。

（二）被遮蔽的逻辑枢纽：孔孟之间的中介缺环

宋儒抬高曾子的同时，也把他的思想简化了。在“孔——曾——思——孟”的单线叙事里，曾子的工作只是转手孔子，自身没有理论创造。可如果细看孔子与孟子之间的思想形态，会发现差距并不小。孔子的论述多是因材施教的应答，围绕仁、礼展开原则性的讨论，没有形成严整体系；孟子已经有以性善论为核心的心性论，有以仁政说为骨干的政治哲学，理论形态高度系统化^[10]。两者之间若没有体系化的转换环节，这种跃迁就缺少解释。

孔门弟子很多，但多数人的传承偏于一端。颜回以德行著称，重在体证仁学境界，早逝且没有系统著述，形不成可传的学派；子贡长于言语政事，偏向儒学外在的事功运用，对内在心性的开拓有限；子路、冉有活跃在政治实践里，思想贡献集中在治理经验层面^[11]。曾子一系则不同：既把握住了孔子仁学的核心，又把它重构为可操作、可传授的体系。就此而言，与其说曾子是孔孟之间被动的传递者，不如说他是主动的奠基者。他的创制，是孔孟之道得以形成完整理论形态的前提。

二、述而有作：曾子对孔子核心义理的内化与固化

曾子对孔子的继承，不是简单的记诵。他在把握孔子思想核心的前提下，做了内向化、具体化、体系化的重构，把孔子原则性的论断变成可以践行的准则和路径。这种“述而有作”的方式，既守住了孔子仁学的内核，也为后来的发展铺了路。

（一）以“忠恕”解“一贯”：仁学枢要的定向

“吾道一以贯之”是理解孔子思想的关键命题，孔门弟子对它的理解并不一致。《论语》里“一贯”出现过两次：一次是孔子告诉曾子，曾子答“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”；一次是孔子问子贡，子贡以“多学而识之”相对，被孔子否定了^[6]。两相对照，分歧很清楚：子贡把孔子之道看作知识的积累，曾子则抓住其内在的统一处，即忠恕。

以忠恕解一贯，不是对孔子原话的复述，而是一种有方向的创造性诠释^[12]。“忠”是尽己之心，落在内在的道德真诚上；“恕”是推己及人，落在外在的伦理实践上。忠恕之道把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的仁学要旨，提炼成具有普遍操作性的方法，让抽象的仁有了人人可行的下手处。这一诠释既锚定了孔子仁学的核心，也为孔孟仁学立起了一条一以贯之的方法线索：上接仁礼统一的旨趣，下开孟子“推恩足以保四海”的仁政理路。当然，以忠恕概一贯并非没有异议，钱穆《论语新解》即提醒，这是曾子就自己体认立言，未可穷尽“一贯”之义^[13]。本文采用程朱一系的解释，是因为就思想史的影响而言，正是这一解释塑造了曾子在道统中的位置，也与本文讨论的建构问题相关。

（二）反求诸己：道德实践的内在化转进

孔子说“为仁由己”，确立了道德实践的主体原则，但具体方法没有展开。曾子在这一点上往前走了一步，把道德实践彻底转向内在，建立起以“内省”为轴的日常工夫。

“吾日三省吾身：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是曾子内省工夫的经典表述。它的要义在于把省察的对象从外在行为转向内在动机：替人谋划是否尽了心，与朋友交往是否守了信，老师教的有没有认真去做。每天固定这样检视自己，抽象的德性要求就变成常态化的自我监督，修身从偶然的道德自觉变成了可坚持、可检验的功课^[4]。

曾子的内省更进一步，凝成“反求诸己”的实践原则。《大戴礼记》所存《曾子》十篇，通篇贯穿着攻恶求过、反躬自省的修身旨趣，把道德困境的出路指向内在的自我修正，而不是外在的条件^[14]。这一取向把孔子“克己复礼”中兼有的外在规约与内在自觉，逐渐挪向内在自律一边，为儒家心性论开了方向，也直接启发了孟子“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）的说法^[15]。

（三）孝为仁本：伦理根基的本体化提升

孔子论孝，多是针对弟子的具体问答，如“无违”“父母唯其疾之忧”“敬”之类，内容基本在家庭伦理的范围内，没有把孝提到普遍本体的高度。曾子把孝从家庭规范中提出来，上升为“天之经、地之义”式的普遍法则，由此立起“孝为仁本”的根基。

《大戴礼记·曾子大孝》说“夫孝者，天下之大经也”，把孝看作天地间的根本法则，一切德行的源头^[14]。旧题曾子所作的《孝经》讲得更系统：“夫孝，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生也”，并把孝的实行从家庭

推到社会国家,“始于事亲,中于事君,终于立身”^[16]。在曾子的建构里,孝不再只是子女对父母的私人情感,而是贯通修身、齐家、治国的普遍原则,是达仁的根本途径。

曾子的孝本伦理,为“家国同构”的治理模式提供了底层逻辑:以孝修身,以孝齐家,以孝治国,终至天下平治。这一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递推结构,后来成为孔孟之道政治哲学的骨干。就文献看,《孝经》未必出自曾子之手,但其核心观念源于曾子学派,可视为曾子孝治思想的系统结集^[3]。

三、范式开创:曾子思想的特异性及其对儒学的拓展

承接孔子,说明曾子重要;开创范式,才显出他的特殊。孔子死后,儒分为八,孔门后学各执一端^[17]。曾子一系未必是唯一的革新者,却是其中走得比较完整的一支:他在内圣工夫、治道框架、人格范型三个方向上,把孔子散落的人格教诲转成可传可践的系统学说。也正因为如此,曾子区别于其他孔门弟子,并深刻影响了后世孔孟之道的形态。

(一) 内圣工夫的系统化:从“克己复礼”到“慎独诚意”

孔子论修身以“克己复礼”为要,兼有内在自觉与外在礼乐两个维度,但多为即境指点,没有形成纯粹内向的工夫系统。颜回的修养以“不迁怒、不贰过”著称,偏于对仁的直觉体证,重境界的呈现,没有留下可复制的修身方法;子贡、子路等人则把力气用在政治实践上,修身服务于事功^[11]。把儒家修身内向化、工夫化并形成系统论说的,首推曾子。

曾子学派的核心文献《大学》提出“慎独”与“诚意”,是修身思想的一次关键推进。《大学》说:“所谓诚其意者,毋自欺也,如恶恶臭,如好好色,此之谓自谦,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”^[8]这里把道德监督的主体从外在礼法与旁人评价,移到了内在的意念发动处。慎独不是独处时守着规矩,而是在念头刚起的隐秘处仍保持自觉,不欺骗自己的内心。

需要说明的是,《大学》系于曾子,是朱熹以来的一种系属传统;《大学》的成书与作者,现代学者仍有异议,梁涛在考辨中即对《大学》与思孟学派的关系多所讨论^[5]。本文从传统系属说立论,取其思想脉络上的关联,并不主张《大学》文本必为曾子亲作。就思想史的影响而言,慎独说的提出确是先秦儒学心性论的重要关节,它把道德实践的根柢安放在主体的内在自觉上^[18]。孔子的“克己复礼”还要借外在礼义引导,曾子的“慎独诚意”则建立起内生的道德动力,使道德实践成为主体的自我要求。这一路向经子思“诚者天之道”的深化,到孟子“存心养性”“集义养气”而成体系,是儒家内圣之学的真正起点。郭店楚简《五行》篇讲“慎其独”,与这一思路相通,可旁证战国前期内圣工夫的传承^{[5][19]};简文中的内省修心之说,也被视为思孟一系修身理论的基石,显出自孔子到孟子修心之说的线索^[5]。

(二) 治道框架的结构化:从“修己安人”到“三纲八目”

孔子的政治理想以“修己以安百姓”为归趣,原则有了,从内圣到外王的具体路径却没有展开。孔子之后从政的弟子不少,大多关注具体措施,没有建起系统的政治哲学框架。曾子学派通过《大学》做了一件新事:把散落的内圣外王理想组织成逻辑严密、阶梯分明的治道框架。

《大学》的“三纲领八条目”就是这套框架。“三纲领”是“明明德、亲民、止于至善”(“亲民”从古本,朱熹虽主“新民”之读,经文仍存“亲民”旧文),从彰明内在德性出发,推己及人教化百姓,终达至善境界。“八条目”即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,构成从认知到修身再到治国的完整序列^[8]。这套体系的关键在于把个人修养与国家治理打通:修身是连接内圣外王的枢纽,格致诚正是修身的功夫,齐治平是修身的展开,层层递进,环环相扣。

《大学》的体系化,标志着儒学从“君子人格教诲”向“系统治道学说”的转轨^[20]。此前孔子的论述主要面向君子个体的德性陶铸,《大学》则给出了一套可推广的社会治理方案。特别是“齐家而后治国”

的推衍，把曾子的孝本伦理与国家治理直接接起来，形成“家国同构”的底层治理逻辑。曾子学派的孝治思想把家庭伦理转成政治伦理，为战国儒家的外王路径提供了支撑^[4]。这套框架经孟子仁政说的拓展，成为后世孔孟之道政治哲学的基本形态，也长期影响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理念。

（三）儒者人格的范式化：从“孔门弟子”到“道的承担者”

孔子时代，儒者还带着职业的色彩。孔子虽分出“君子儒”与“小人儒”，确立了德性要求，却没有明确儒者的独立使命。曾子提出“弘毅”人格，把儒者从“孔子的学生”提升为“道的承担者”，塑造了士大夫“以道自任”的传统。

《论语·泰伯》载曾子语：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^[6]这段话的分量在于，它把儒者的天职从习礼乐、辅君长，提升为对仁道的终身承担。“弘”是志量广大，“毅”是意志坚定，合起来构成承担道统所需的精神品格。先秦士阶层的精神觉醒，核心是确立“道高于势”的价值信念，曾子的弘毅之说正是这一信念的早期表达^[21]。

曾子的弘毅人格，上承孔子“君子喻于义”的理想，下启孟子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的大丈夫气象。两者在“以道自任、守持原则”上前后相续：曾子讲“仁以为己任”的担当，孟子进一步标举士人独立于政治权力的人格尊严。孔孟之道中理想人格的赓续，经由曾子这个中介完成。这种人格范式的确立，既塑造了后世士大夫的精神底色，也成为孔孟之道中最有感染力的部分。

四、从曾子到孟子：孔孟之道的逻辑跃迁与枢纽价值

曾子的创制不是孤立的事件，它处在孔子仁学向孟子体系化学说转换的关键位置上。孟子心性论与仁政说两大系统，都能在曾子思想中找到源头。以往论者多注意子思与孟子的关系，对曾子的奠基之功谈得少。在“孔子——曾子——子思——孟子”的链条里，曾子是第一个转折点：他把孔子思想引向内在化与体系化，为思孟学派的展开开了路。

（一）心性论的承递与深化：从内省慎独到性善养气

孟子心性论以性善论与存心养性为核心，这条路径的源头是曾子开创的内向修身传统。孔子很少谈人性，只留下“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”的论断；曾子通过内省、慎独、诚意的工夫，把道德的根基一步步引向内在心性，为性善论作了铺垫。

曾子的“反求诸己”与“慎独诚意”，预设了人内在有道德判断的能力与向善的可能。这种向内求索的路向，自然会引出对人性本质的追问。子思承其绪，提出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”，把道德心性与天道接通，抬高了心性论的本体地位。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性善论，认为人天生有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四端，修养就是扩充这些善端^[12]。

孟子的“万物皆备于我矣，反身而诚，乐莫大焉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直接接续了曾子的内向路径。曾子言“诚其意”，子思言“诚者天之道”，孟子言“反身而诚”，线索清晰。孟子的“集义养气”，也是曾子内省工夫的深化。不过要说明，思孟心性论的形成并非单线：郭店简《性自命出》《五行》等篇的归属，学界有子思说、子游说之争，早期儒学的心性讨论本是多元并进的^[5]。本文不主张曾子独传，而是说曾子代表并开启了其中的内向化路向，这一路向经子思、孟子而发扬光大。宋儒把《大学》《中庸》分别系于曾、思，固然是建构，却并非全无思想逻辑的根据^[22]。

（二）仁政说的逻辑源头：从孝本治国到推恩保民

孟子的仁政说，是孔孟之道政治哲学的核心，其逻辑源头在曾子的孝本伦理与《大学》的家国同构框架。孔子论政讲“为政以德”，德治的具体路径没有展开；曾子通过孝本伦理，打通了家庭伦理与国家治理的通道。

曾子学派认为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，治国的基础在齐家，齐家的枢要在孝悌。《大学》说“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，无之”，把齐家当作治国的前提。这种由家及国、由亲及疏的推恩逻辑，正是孟子仁政说的方法论。孟子讲“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。天下可运于掌”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，君主把仁爱之心推出去就能治天下，这正是曾子“孝本治国”思路的拓展^[15]。

曾子学派的孝治思想把家庭伦理转升为普遍的政治原则，构成战国儒家外王路径的基础形态^[4]。孟子又提出制民之产、轻徭薄赋、谨庠序之教等具体措施，把曾子的原则框架发展为系统的政治方案。从孔子的“为政以德”，到曾子的“孝本治国”，再到孟子的“仁政学说”，儒家的政治哲学形成一条清晰的演进线索，曾子是其中承上启下的环节。

（三）道统叙事的双向建构：思想传承与诠释重构

曾子在孔孟之道中的枢纽地位，既是思想传承的结果，也是后世道统建构的产物，两者互相作用。一方面，曾子的思想确然构成孔孟之间的逻辑中介，有真实的传承线索；另一方面，宋儒建构“孔孟之道”时，正是通过抬高曾子、重释《大学》，完成了以内圣为枢轴的儒学重构。

道统的建构并非全然主观，它以早期儒学的真实脉络为底子，又掺入了建构者自己的理论诉求^[5]。宋代理学家要回应佛老的挑战，需要一套心性论和传道谱系；曾子开创的内圣工夫与《大学》的体系化框架，恰好合于这种需要。把曾子放进道统中枢，把《大学》升为四书之首，孔孟之道便被诠释成以内圣为本、由内圣开出外王的体系。宋代四书学与理学的建构，本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^[20]。

换言之，今天所说的“孔孟之道”，不是孔子与孟子思想的简单相加，而是经过曾子学派筛选、诠释、体系化，又经宋儒重新阐释的儒学形态。曾子的特殊，在于他既是先秦儒学传承的枢纽，又是后世孔孟之道叙事建构的节点。理解曾子，才能理解孔孟之道的生成逻辑。

五、讨论与反思

（一）“传述”与“创制之辨”：体系化本身即思想创造

有一种看法认为，曾子只是孔子的传述者，没有独立的理论创造，他的地位是后世道统建构出来的。这种看法把“原创”理解窄了，好像只有提出全新命题才算创造，体系化的工作不算。

在先秦儒学的发展里，把零散观念系统化、把原则性教诲工夫化，本身就是重要的理论创造^[4]。孔子的言论多是随宜指点，缺乏系统架构；若没有后续的体系化，儒学很可能像其他诸子一样在传承中分化消散。曾子的贡献，正在于抓住孔子思想的内核，把它组织成涵括工夫、治道、人格的完整体系，让儒学有了可传、可推广的形态。这种体系化的创制，价值不亚于提出某个具体观点。

中国思想史上的许多推进，都以体系化重构的形式出现。孔子“述而不作”，却立起儒家的基本格局；朱子集注四书，重塑了宋明理学的面貌。思想的传承从来不是复制，而是诠释中的创造。曾子正是以这种诠释与建构，成为孔孟之道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人物。

（二）儒学分化中的路径选择：曾子一系何以成为主流

孔子之后，儒分为八，各派路径不同：曾子一系走内向修身，子贡一系重事功，子夏一系重传经，荀子一系重礼乐^[17]。最终只有曾子一系进入道统正统，成为后世孔孟之道的主流，这既有思想本身的原因，也有历史选择的因素。

曾子一系的取向，最贴合中国传统社会“家国同构”的治理需要，也最能满足个体安身立命的精神需要。就治理层面看，“修身——齐家——治国——平天下”的框架与宗法社会的结构高度契合，为家国一体的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撑；就精神层面看，内圣工夫给士人一条不依赖外在条件的自我完善之路，乱世里也能保持精神的独立与安定^[11]。

一种思想能否成为主流,不只取决于理论是否精密,还要看它能否回应时代的普遍需要^[23]。曾子一系的儒学既有完善的个体工夫,又有系统的治理方案,兼顾了精神与治理两方面的需求,因而在众多派别中胜出。荀子一系汉唐时期影响很大,但偏重外在礼乐制度,缺乏精微的心性工夫,宋明以后渐渐退出儒家的核心叙事^[10]。早期儒学的这种分化,说明孔门后学在战国之际已就心性、性情等形上问题展开深入讨论,并呈现出明显的“内转”趋向,而这一趋向正是孟子出场的背景^[22]。

(三) 谱系真伪之辨:“传道”说的限度

“孔——曾——思——孟”的授受谱系,历史上并非没有质疑。南宋叶适就认为“孔子歿,或言传之曾子,曾子传子思,子思传孟子”并无事实根据^[24];清代崔述在《洙泗考信录》中则对孔门弟子言行的记载多所考订,对传道之说持审慎态度^[25]。对这些质疑,本文的回应是:把“传道”理解为思想史上的诠释性事实,而不是可以逐节实证的师徒交接记录。

就文献所能支持的部分看,曾子与孔子、曾子与孟子之间的思想关联是清楚的:《论语》“一贯”章、《曾子》十篇与《大学》的思想取向,以及孟子对曾子言行的称引,都构成这种关联的证据。至于“曾子传子思”这类具体环节,则缺少直接史料,只能存疑。宋儒把这种思想关联编织成单线谱系,是出于建构的需要,其思想史意义应当肯定,其历史叙述的限度也应当说明。明确这一点,才能既承认曾子的枢纽地位,又不把道统谱系误当作铁板一块的史实。

六、结论

“孔孟之道”不是孔子与孟子思想的直接对接,中间经过了曾子学派的转换与重构。长期以来,曾子在道统叙事中被定为“过渡性人物”,其理论创制的价值被低估。本文的考察表明:在思想传承上,曾子以“忠恕”定向一贯之道,以“反求诸己”推动仁学实践的内在化,以“孝为仁本”立起伦理的本体根基;在范式开创上,他建构了慎独诚意的内圣工夫,设计了三纲八目的治道框架,塑造了弘毅担当的儒者人格。这三大创制,使儒学从散落的人格教诲转向系统的理论体系。

从思想演化看,曾子开辟的内向路向经子思深化,催生了孟子的心性论与仁政说,构成孔孟跃迁的逻辑中介;宋儒建构道统,也是依托曾子与《大学》的思想资源。今天所认知的孔孟之道,其底层框架在很大程度上由曾子学派奠定。与此同时,本文也强调:曾子不是唯一的传承者,早期儒学本是多元并进;道统谱系是思想史的建构,其限度应当被正视。

重估曾子的地位,既能补全孔孟传承的链条,也有助于理解早期儒学的分化与道统建构的机理。儒学的发展不是单一的线性传递,而是在诠释与创造中逐步演进的。曾子作为承上启下的人物,其创制的意义,正体现在中国思想“述而有作、守正开新”的传统之中。

利益冲突

作者声明,在发表本文方面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蔡方鹿. 中华道统思想发展史 [M]. 北京: 人民出版社, 2019.
- [2] 程颢, 程颐. 二程集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1.
- [3] 舒大刚. 《孝经》论衡: 百善之先, 群经之统 [M]. 福州: 福建人民出版社, 2018.
- [4] 罗新慧. 曾子研究: 附《大戴礼记》“曾子”十篇注释 [M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13.
- [5] 梁涛. 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 [M]. 北京: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2008.
- [6] 刘宝楠. 论语正义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90.

- [7] 司马迁. 史记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2.
- [8] 朱熹. 四书章句集注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3.
- [9] 郭焄. 宋代曾子道统地位的确立 [J]. 孔子研究, 2022(2): 100-109.
- [10] 王博. 中国儒学史·先秦卷 [M]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1.
- [11] 王长华. 春秋战国士人与政治 [M]. 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1997.
- [12] 杨泽波. 孟子性善论研究 [M]. 北京: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2010.
- [13] 钱穆. 论语新解 [M]. 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02.
- [14] 王聘珍. 大戴礼记解诂 [M]. 王文锦, 点校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3.
- [15] 焦循. 孟子正义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7.
- [16] 阮元. 十三经注疏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9.
- [17] 王先慎. 韩非子集解 [M]. 钟哲, 点校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98.
- [18] 李景林. 教化的哲学: 儒学思想的一种新诠释 [M]. 哈尔滨: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, 2006.
- [19] 荆门市博物馆. 郭店楚墓竹简 [M]. 北京: 文物出版社, 1998.
- [20] 朱汉民, 肖永明. 宋代《四书》学与理学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9.
- [21] 余英时. 士与中国文化 [M]. 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3.
- [22] 李景林. 教养的本原: 哲学突破期的儒家心性论 [M]. 沈阳: 辽宁人民出版社, 1998.
- [23] 葛兆光. 中国思想史 [M]. 上海: 复旦大学出版社, 1998.
- [24] 叶适. 习学记言序目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77.
- [25] 崔述. 崔东壁遗书 [M]. 顾颉刚, 编订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3.